

汉语
修辞格
大辞典

HANYU XIUCIGE
DACIDIAN

上海辞书出版社

汉语
修辞格
大辞典

谭学纯 濮 侃 沈孟璿 主编

HANYU XIUCIGE
DACIDIAN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修辞格大辞典/谭学纯,濮侃,沈孟璁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11

ISBN 978 - 7 - 5326 - 3103 - 2

I. ①汉... II. ①谭... ②濮... ③沈... III. ①汉语—修辞—词典 IV. ①H15 - 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3878 号

责任编辑 徐祖友 王慧敏
特约编辑 王安全
装帧设计 姜 明

汉语修辞格大辞典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印刷技工学校实验工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9.25 插页 5 字数 862 000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3103 - 2/H · 402

定价: 4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56199858

辞格生成与理解:语义·语篇·结构

(前言)

谭学纯

中国当代语言学研究,在不同的子学科,有不同的研究热点,呈现出不同的研究格局和学术气象。当语法研究在解释语法现象的成因机制、分析语法现象与其他语言现象之间的互动关系等方面产生了一批学术含量较高的成果时,修辞格研究的方向性选择与传统格局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

相对于语法研究的局部深化、细化及其显示的规模效应,辞格研究学术含量的提高与成果数量的递增也许没有同步(陆俭明,2008)。《中国修辞史》(宗廷虎、陈光磊,2007)中、下卷对10余种辞格的梳理、汇聚、评析和再阐释,作为获得高级别奖项的新成果,修辞学界可能尚未来得及消化,目前未见示范效应和辐射效应。而且,见于《中国修辞史》的10余种修辞格阐释,在数百种汉语辞格构成的庞大系统中,毕竟还不能涵盖辞格生成与理解的复杂现象。

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

(一)从20世纪汉语修辞格研究的总体学术面貌看,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唐钺,1923;陈望道,1932;谭永祥,1983、1996),都侧重辞格功能和修辞效果的描写。其中,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对这种研究模式的持续影响最大。由于陈望道在中国修辞学界的学科奠基地位和广泛影响力,《修辞学发凡》的辞格研究模式,一直为其后的学者们效仿。今天的学者面对这一学术现实,既应该看到后来者对学术先驱的崇敬,也需要对学术接力过程中的学术创新以及学者心态和学术体制作深度透视——这里的负面因素不是上一代学者的缺失,因为:一代学者有一代学者的学术使命,一代学者有完成自己学术使命的学术环境和理论背景。不能用当下的学术眼光评估辞格研究的历史风景。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部分学者的辞格研究已经呈现出不同层次的走出“例证+描写”的学术面貌(吴士文,1986;张炼强,1994;刘

大为,2001;徐国珍,2003;王珏等,2008;徐默凡,2010),但此类研究受制于两种因素:纵向地看,20多年的时间跨度,同类研究的关注焦点不断变化,少有持续性的高显示度成果;横向地看,多为学者的个人行为,较少团队跟进,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三)近年修辞学研究出现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转型(胡范铸,2003;罗渊,2008),学术转型背景下的修辞学研究范围和关注焦点一度淡出辞格,“辞格中心论”受到质疑。修辞学研究转型更多地带有学科生长和学科重建的关怀意向。这种转型,不是对此前修辞学研究的否定,而是表明:学术活动的主体在参与学术传承的同时,以开放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视界为再出发的起点。学者们意识到:修辞学发展史不等于辞格研究史、修辞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辞格、修辞学研究方法不应该交付一个恒定模式,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重建多元化的修辞研究格局便成为研究主体努力探寻的目标。

以上原因产生了辞格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的两个问题:

1. 现有同类研究成果,包括期刊论文、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专著、工具书等,^①需要梳理、筛选和某些方面的再阐释,汇集已经开发和正在开发的学术资源,这是“为什么”编撰《汉语修辞格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的动机之一。

2. 辞格研究需要深入,探究辞格生成与理解的机制,以及辞格与其他语言现象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陆俭明,2008),走出“例证+描写”的研究格局,这是《大辞典》“怎么编”的努力方向之一。

二者合成了《大辞典》编写组基于言语运用和言语理解的编撰理念。在操作层面,对辞格的语义、辞格在语篇中的功能及其成因机制的观察与解释,对辞格结构的辨识,是本辞典希望展示的学术看点。

一、语义:辞格生成与理解的认知基础

语义是辞格的认知基础,辞格生成的途径和辞格理解的可能性十分丰富,最终都通过语义接通认知通道。辞格生成与理解过程中提取的语义特征可以不同于自然语义,也可以借助自然语义,二者都经过不同程度的语义修辞化变异(谭学纯,2005a,2008a,2009a)。

2 汉语修辞格大辞典

(一)语义修辞化变异模式 1:源语义(自然语义)→目标语义(非自然语义)

(1)幼年读的“左传右传”、“公羊母羊”,还有平日做的打油诗、放屁诗,零零碎碎,一总都就了饭吃了。(李汝珍《镜花缘》)

例(1)的修辞信息主要是“左传右传”、“公羊母羊”传递的。

从“左传”生成“右传”,初始生成“别解”格,再生成“仿拟”格。经过两道程序:

第一步,修辞化地处理源语《左传》的语义信息,出于修辞目的,不提取“左传”(《左传》)的原初语义,而将姓氏符号“左”别解为方位符号“左”,生成“别解”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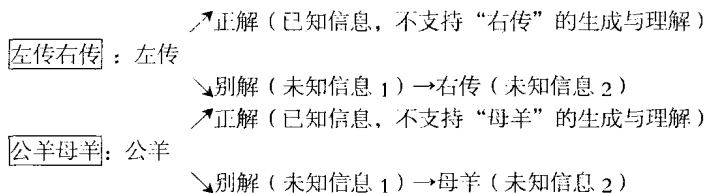
第二步,通过空符号置换,用方位符号“右”替换别解的方位符号“左”,仿造出“左传”的对立项“右传”,生成“仿拟”格。

从“公羊”生成“母羊”,两道程序同上:

第一步,修辞化地处理源语《公羊传》的语义信息,出于修辞目的,不提取“公羊”(《公羊传》)的原初语义,而将姓氏符号“公羊”别解为性别符号“公”(雄性)+动物符号“羊”,生成“别解”格。

第二步,通过空符号置换,用性别符号“母”替换别解的性别符号“公”,仿造出“公羊”的对立项“母羊”,生成“仿拟”格。

“左传右传”、“公羊母羊”中的“左传”、“公羊”,都是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共在的信息单位,同时存在正解和别解两种可能——



图示表明:正解的“左传”(《左传》)不支持“右传”的生成与理解:从正解的姓氏符号“左”到方位符号“右”,仿拟的认知路线改道;正解的“公羊”(《公羊传》)也不支持“母羊”的生成与理解,从正解的姓氏符号“公羊”到性别符号“母(羊)”,仿拟的认知路线未能有效接续。

“左传右传”/“公羊母羊”生成与理解的关键不是正解,而是别解。

根据“左传右传”/“公羊母羊”的自然语序,认知主体的信息处理是从“左传”到“右传”、从“公羊”到“母羊”。由于例(1)源语和目标语同现,而源语的语义经过了修辞变异,因此目标语的认知参照需要避免源语的自然语义干扰,即避免源语《左传》/《公羊传》的原初语义干扰目标语生成,确保“右传”/“母羊”成为“左传右传”/“公羊母羊”的完型修辞成分。排除认知主体对《左传》/《公羊传》可能存在认知空白或认知偏误,例(1)的认知路径需要避开正解的自然语义,选择别解的非自然语义。

(二)语义修辞化变异模式 2:源语义(自然语义 X)→目标语义(自然语义 Y)

在辞格生成与理解的关键语词属于不同义位的条件下,通过同一关键词语义不同义位的人为拼接或置换完成认知过程。

(2) 角色 A(赵本山):请听题,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虱子?

角色 B(范伟):因为我家的小狗讲卫生。

角色 A(赵本山):错。

角色 C(高秀敏):因为狗只生狗,不生虱子。(中央电视台

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小品《卖车》)

提取例(2)关键词义位置换的源语、目标语语义:

(2a)生:生育。(生狗)

(2b)生:生长。(生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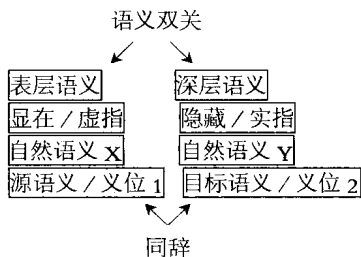
从话语衔接的要求说,“生狗”的“生”与“生虱子”的“生”处于不同义位,不存在语义关联和逻辑关联,语用环境中的人为拼接,把语义关联、逻辑关联的不合理转化为修辞关联的合理。换句话说,例(2)的认知支持,不是来自语义关联、逻辑关联,而是来自修辞关联。在认知链上,(2a)和(2b)的“生”已经断开,是修辞支持了二者的重新链接,生成了“多饰”格。接受者也只有修辞层面,才能认同这种语义偷换。否则,例中真正的错答,不是角色 B,而是角色 C的“噱头”。

(3)人类没有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联想集团广告)

例(3)属于现有辞格研究关注较多的语义双关。表面上看,双关的双重语义是平行的。但是问题可能正出在表面平行的双重语义上。进入具体语境的双关,为什么语义指向不是可此可彼,而是言此意彼?关键词“联想”作为动词和专有名词,同现而且同辞,为什么没有对“联想”的语

义理解产生干扰,正因为双关语词的语义指向一虚一实,一显一隐,显在的表层语义是双关语词的自然语义 X,是虚指;隐藏的深层语义是双关语词的自然语义 Y,是实指。在辞格生成阶段,隐藏的深层语义借助显在的表层语义,完成语义单指向语义双指的转化;在辞格理解阶段,排除语义虚指的干扰,提取实指的语义信息,完成语义双指向语义单指的还原。语义双关修辞功能的实现,在辞格理解阶段,要求提取实指的语义信息,如果提取虚指的语义信息,那么结果将是:在辞格生成阶段完成了的语义双关,到辞格理解阶段被破坏。

双关语词的语义 X 和 Y,处于同一关键词语义的不同义位。进入动态语用环境的“语义双关”具体用例十分丰富,语义修辞化变异模式却相对有限。如图:



具体到例(3)来说,可能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否将专用名词“联想”的语义视为自然语义?我倾向于自然语义不排除具有社会公认度的专用名词语义。

比较模式 1 和模式 2 的语义变异路径,可以观察到:模式 1 的目标语义是源语的自然语义变异为非自然语义(谭学纯, 2008b);模式 2 的目标语义修辞化地改变源语的话语逻辑和认知方向,在该辞格所依托的语词自然语义系统中,通过义位转移,由此义项向彼义项变异,属于动态语用环境中强制性的链接自然语义的不同义位。

模式 1 和模式 2 的语义修辞化变异各自都可以再细分,且在同一种辞格中有时存在交叉现象,这种复杂性对辞格研究的深化和细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辞典》注意到了这类现象。

辞格生成与理解过程中,认知主体对语义修辞化变异的信息处理可

以同步,也可以不同步。前者建立在表达者和接受者的共享经验和变异后的语义公设基础上,后者相对复杂。如:

“飞白”格指的是明知其错,故意效仿的修辞现象,但是在辞格生成与理解过程中观察“飞白”,情况复杂得多。简如下图:

修辞过程	辞格生成		辞格理解
修辞角色	表达者 1	表达者 2	接受者
言语行为	出错	仿错	纠错

从辞格生成过程说,表达者 1 出错,表达者 2 仿错,因此“飞白”又称“拟误”。而从辞格理解过程看,“拟误”的命名并不确切,因为辞格理解的纠错是从辞格生成的认知偏误回复正确认知。仿错或纠错,都经历潜在的语义还原,这个还原过程在文本中有时观察不到。

(4)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鲁迅《狂人日记》)

“本草什么”是明代中药书名《本草纲目》的表达之误,这种在辞格生成过程中由表达者 1(狂人)发生的表达之误,经由表达者 2(鲁迅)的效仿,转换为辞格理解过程中的纠错。《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话语毕竟不是真实的狂人话语拷贝,而是鲁迅作为表达者 2 效仿表达者 1 的话语。鲁迅效仿的是狂人话语错误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例如言说者失记或其他)。可能容易乱人耳目的是,狂人话语的原文没有“出错”(即认为鲁迅出于小说叙事需要而效仿的“狂人”话语为真实的日记原文),因此无所谓“仿错”(其实可以对照曹雪芹模仿《红楼梦》中史湘云所说的“爱哥哥”——不是史湘云话语的拷贝)。正因为存在比较隐蔽的出错、仿错、纠错,所以认知过程压抑目标语“本草什么”的错误信息,激活源语“本草纲目”的语义。换个角度说,辞格生成与理解过程中的“合作原则”所依赖的共享信息之一《本草纲目》,已被语境信息“李时珍”和“本草什么”共同锁定,修辞表达与接受双方的知识库存中如果缺少备选信息“李时珍”或“本草什么”,例(4)不可能将言语交际中的消极因素——错误表达,转化为积极的修辞效果。

这方面,现有辞格研究给出的解释不多,解释的必要和理据都有可

以开发的话语空间。

二、语篇：辞格生成与理解的可开发空间

现有的辞格研究，多注重词、句、段的修辞技巧，较少关注辞格的语篇建构功能。关于后者，有必要区别以下研究类型：

其一，超句研究不等于辞格的语篇建构功能研究。超句研究有时涉及辞格问题，通常是描写作为超句的辞格所具有的修辞功能，虽然以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为观察点，但辞格的解释空间基本上仍在辞格自身，较少向语篇延伸。

其二，辞格的篇章研究涉及构成篇章的语段按何种辞格组合（郑文贞，1985、1991；李胜梅，2006），研究思路多为组词成句的辞格放大为组段成篇的辞格。工作原理类似汉语合成词的构成方式用来解释汉语短语的构成方式，这是同一规则、同一功能在语言不同层级的体现。工作原理相同的组词成句的辞格研究和组段成篇的辞格研究，与本文所说辞格的语篇建构功能不是一回事（谭学纯，2008c）。

其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篇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路向偏于语用解释（王志文，1994；胡壮麟，1996；刘伟，1999；彭小川，1999；曹秀玲，2000；郑贵友，2001；张德禄、刘汝山，2003；刘臣，2003；杨玉玲，2005；方梅，2005；屈承熹，2006；邢欣、张发祥、高兵、郑庆君、高德新，2007）。近年语篇研究升温，其中不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但关注焦点多为语法范畴、语义关系等。以辞格为观察点，解释辞格承担的语篇建构功能的研究成果很少。偶有涉及，也多限于隐喻、象征之类，这主要因为隐喻、象征既可以组词成句，也可以组段成篇（谭学纯，2005b）。

二、三两类研究，或者以辞格为研究对象，涉及语篇；或者以语篇为研究对象，涉及辞格，二者都较少关注辞格的语篇建构功能。

在语篇框架中开发辞格生成与理解空间，需要区分辞格的叙述调节功能和语篇建构功能。以“异称”格（从不同视点为同一人物不同角色身份进行不同命名的一种修辞方式，是同一人物不同身份符号的修辞聚合体）为例：

（5）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也站在大门口论革命，阿

Q 没看见，昂了头直唱过去。

“得得……”

“老 Q，”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

“锵锵，”阿 Q 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联结起来，以为这是一句别的话，与己无干，只是唱。“的，锵，锵令锵，锵！”

“老 Q。”

“悔不该……”

“阿 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 Q 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

“老 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

“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

“阿……Q 哥，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惴惴不安的说，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

“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阿 Q 说着自去了。（鲁迅《阿 Q 正传》）

《阿 Q 正传》中的 Q 哥、老 Q，作为阿 Q 的“异称”指向中同一行为主体与周围人的不同角色关系，投射出小说主人公的地位在周围人物心目中的变化。此类“异称”的修辞功能是叙述话语的局部调节。借助转换式可以发现：例中 Q 哥、老 Q，如果都换用阿 Q，不影响语篇整体结构，属于语篇局部人物身份符号选择的生动形式。

但是，下面的例子中，“异称”的修辞功能，却需要联系语篇的整体格局来解释：

（6）那个坐在吉姆牌轿车、穿过街灯明亮、两旁都是高楼大厦的市中心的大街的张思远副部长，和那个背着一篓子羊粪、屈背躬腰、咬着牙行走在山间的崎岖小路上的“老张头”，是一个人吗？他是“老张头”，却突然变成了张副部长吗？他是张副部长，却突然变成了“老张头”吗？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抑或他既不是张副部长也不是老张头，而只是他张思远自己？（王蒙《蝴蝶》）

张思远、张副部长、老张头，指向小说中同一行为主体的不同角色身份，分别隐含着作者不同的叙述动机：张副部长关涉人物的高峰体验，老张头关涉人物的底层体验，张思远面对同一自我的不同身份，不断地追问、

陈述和评判。

除了张副部长、老张头,《蝴蝶》主人公张思远的异称在整个语篇中十分丰富:

亲属身份:小石头、父亲、丈夫

职权身份:张指导员、张主任、市委书记

革命异己身份:叛徒

出于语篇建构的需要,小说主人公张思远以“小石头”身份展开的意识流,不能是“父亲”或“丈夫”的意识流,也不能是“张指导员”、“张主任”、“张副部长”、“市委书记”的意识流,更不能是“叛徒”的意识流。同一人物心理的意识流动与人物不同身份符号的修辞聚合,推动了《蝴蝶》的语篇叙事,支持了语篇生成与理解。正是小说中同一人物不同角色身份的意识流,主人公多重身份的混杂和转换,建构了属于《蝴蝶》的规定历史时空,控制着《蝴蝶》的叙述路向,规约语篇整体结构,使之定型为特定样态。(谭学纯,2008c)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承担叙述调节功能的“异称”,以词句段为单位或以语篇为单位观察,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承担语篇建构功能的“异称”,以词句段为单位或以语篇为单位观察,结果不一样。此类研究可能关联着另一个话题:文学语篇分析如何始于语言学观察,而不终于单纯语言学的解释(谭学纯,2006、2009b/c)。

三、结构:辞格生成与理解的可识别标志

进入言语运用和言语理解的修辞格,应便于识别。

辞格识别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观察,结构是其中最具区别特征的观察点之一。《大辞典》梳理已入典而宜删除的辞格、梳理已入典而宜归并的辞格、增加应入典而未入典的辞格,依据之一,便是结构。这种考虑,有四个理由:

(一)结构是辞格的可识别标志

描述可以观察到的结构形式,是辞格识别的重要参照。

《大辞典》分析“杂混”修辞格,据(胡范铸,1987):

(7)我们的干部如果没有本事,像渤海二号的船长一样,那么,

今后问题就不仅是出在渤海,也可能出在黄海、出在东海、出在南海,也可能出在上海。

“杂混”的结构包括两部分:铺排项和混杂项。铺排项连续列出的人或事物,属于同类聚合,作用于言语运用和言语理解的求同思维。混杂项是与铺排项不同类的人或事物,属于另类相杂,作用于言语运用和言语理解的求异思维。例中铺排项“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属于同类聚合的具体海域,混杂项“上海”属于另类相杂的城市专名。混杂项将铺排项由同类事物聚合所产生的求同思维引向求异思维,利用言语表意的方向性改变产生修辞效果。

(二)结构是辞格的差别性标志

一种辞格与另一种辞格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在于结构的区别。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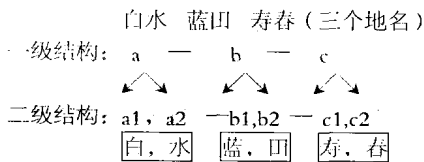
“顶真”格:链式结构 a—(b)—c,c—(d)—e

“回环”格:环式结构 a—(b)—c,c—(d)—a^②

“离合”格:显隐结构——隐藏一级结构,分离为显性的二级结构。必须还原出隐藏的一级结构,才能产生符合辞格生成规则的理解:

(8)云容复枕无非白,水色侵矶直是蓝。田种紫芝餐可寿,春来何事恋江南。(陆龟蒙《和龚美怀鹿门县名诗离合其二之一》)

观察例(8)的辞格结构:



所谓“离合”,在辞格生成环节,需要把隐藏的一级结构 a—b—c,分离为二级结构 a1, a2 — b1, b2— c1, c2。在辞格理解环节,需要把分离的二级结构 a1, a2 — b1, b2— c1, c2 还原为一级结构 a—b—c。

《大辞典》共归纳整理出近 600 条具有可比性的辞格和相关语言现象,进行细致的辨析,其中有的是辞格系统内的类同易混现象,有的是辞格与非辞格类同易混现象(如“仿拟”/“戏拟”、“移用”/“移情”、“互文”/“互文性”),辨析的识别和区分基础,很多都是从结构观察的。

(三)结构是辞格下位层次的分类标志

一些辞格下位层次的分类依据,是内部结构。

“换述”格的结构包括三部分:已述项、换述标记、换述项。已述项在前,换述项在后,换述词语是两者的联系标志,也是区别标志。据此可以把换述分为3类:

释言式换述:A,即B(功能相同的换述词语标记另如:就是说、也就是说、这就是、意思是、意思是说)

换言式换述:A,或者说B(功能相同的换述词语标记另如:换言之、换句话说、反过来说)

总言式换述:A,总之B(功能相同的换述词语标记另如:总而言之、总起来说、一句话、综上所述、简而言之)

“换述”在上文已经叙述的基础上,改换一种说法进行新一轮叙述。表面上看,前后的叙述好像是等值的,实际上二者形成互补,后面的叙述对前面的叙述有突出强调、简洁概括、说明解释等修辞功能。

(四)结构是辞格存疑的参考依据

一些修辞格工具书或论著将“幽默”、“淡抹”等视为独立辞格,《大辞典》尊重现有研究成果。同时考虑可能的认识纠缠:具有“幽默”、“淡抹”风格的诸多辞格具有可识别的结构形式,但这种可识别的结构形式不属于“幽默”、“淡抹”本身。《大辞典》在上述条目前以*号标记,表明对辞格与非辞格界限的谨慎态度。

也有一些修辞格论著将“计白”视为独立辞格,指的是表达者有意识地运用交际双方的背景知识和心理图式,省略会话过程中的某些推理步骤和程序,用特定的言语形式激活双方的共享知识,完成言语行为:

(9)诗人海涅因为是犹太人,经常受到各种非礼。在一次晚会上,一个旅行家不怀好意地对他说:“我发现了一个小岛,这个小岛上居然没有犹太人和驴子!”海涅白了他一眼,不动声色地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只要我和你一同到小岛上走一趟,就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了!”旅行家被嘲弄得满脸通红。

例(9)没有明显的结构标志,确认“计白”的辞格身份应谨慎。汇集汉语修辞格研究最新成果的《大辞典》尊重研究者对“计白”语言现象的发现、命名和解说,但在确认“计白”的辞格身份时,用*标记,即是考虑“计白”没有明显的结构标志。作为一种对照,《大辞典》收入了与“计白”格

字面相近的“留白”格,参考依据是“留白”通常是一个未完型的结构。未完型,可视为“留白”辞格的结构标志。

四、结语

语义、语篇、结构,在辞格生成与理解过程中是互相关联、互相支持的不同侧面,本文分而论之,出于讨论的方便。

作为注重学术性的工具书,《大辞典》编撰过程中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很多。例如条目安排,本辞典对容易产生主条、分条和副条认知纠缠的辞格命名,采取减少错乱的处理方式,如“隐喻”:

如果立为主条,一级辞格隐喻 > 比喻。前者包括拟人、夸张等。

如果立为分条,二级辞格隐喻 < 比喻。现代汉语中的隐喻 = 暗喻。古代汉语中的隐喻有时指借喻。

如果立为副条,隐喻不同于一级辞格或二级辞格的同格异名条目。

仅仅在辞格系统内,隐喻 > 比喻 / < 比喻 / = 暗喻 / = 借喻。此外,在认知语言学中,隐喻是一种认知方式。

考虑以上原因,《大辞典》立目,在一级辞格“比喻”的下位层次,取二级辞格“暗喻”,避免“隐喻”立为主条、分条或副条带来的相关问题。

汉语修辞格的系统梳理和阐释,可以开发的学术空间很宽广。这是一个庞大的学术工程,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要实现我们的目标期待,有赖于语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大辞典》尝试问津部分难题的探索意向、尝试解释部分难题的实践操作,只是刚刚开始。

注释:

①本辞典所附 1977—2009 年国内修辞格研究成果篇目索引,汇集汉语界和外语界辞格研究成果篇目 4 万余种。

②濮侃认为,顶真的轨迹是直线,回环的轨迹是圆周,实际上即是以结构为观察点的比较识别,参见濮侃《辞格比较》,142 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参考文献:

- 曹秀玲 2000 汉语“这/不”不对称性的语篇考察[J].《汉语学习》第4期.
- 陈望道 1932 修辞学发凡[M].上海:大江书铺.
- 方梅 2005 篇章语法与汉语篇章语法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高兵 2007 语篇理解中语境对代词理解的影响[J].《心理学报》第4期.
- 高德新 2007 跨小句语篇连贯的语义阐释[J].《外语研究》第5期.
- 胡范铸 2003 从“修辞技巧”到“言语行为”——试论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语用学转向[J].《修辞学习》第1期.
- 胡范铸 1987 幽默语言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 胡壮麟 1996 有关语篇衔接理论多层次模式的思考[J].《外国语》第1期.
- 李胜梅 2006 修辞结构成分与语篇结构类型[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 刘臣 2003 现代汉语篇章管界问题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 刘大为 2001 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刘伟 1999 作为篇章连接成分“相反”[J].《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陆俭明 2008 汉语修辞研究深化的空间[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 罗渊 2008 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屈承熹著,潘文国等译 2006 汉语篇章语法[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彭小川 1999 论副词“倒”的语篇功能[J].《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
- 王珏等 2008 构式等级降低与辞格生成[J].《修辞学习》第1期.
- 王志文 1994 词汇衔接与语篇[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5

期.

- 谭学纯 2005a 语言教育:概念认知和修辞认知[J].《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
- 谭学纯 2005b “弃子逐臣”:一个结构性隐喻[N].《光明日报》8月22日.
- 谭学纯等 2008a 比喻义释义模式及其认知理据[J].《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谭学纯 2008b 语用环境:语义变异和认知主体的信息处理模式[J].《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 谭学纯 2008c 身份符号: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J].《文艺研究》第5期.
- 谭学纯 2006 再思考:语言转向背景下的中国文学语言研究[J].《文艺研究》第6期.
- 谭学纯 2009a 亚义位和空义位:语用环境中的语义变异及其认知选择动因[J].《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 谭学纯 2009b 中国文学修辞研究:学术观察、思考与开发[J].《文艺研究》第12期.
- 谭学纯 2009c “祈使一否定”推动的语篇叙事——一个微型语篇的形式、功能及话语分析[R].第五届汉语语法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武汉.
- 谭永祥 1983 修辞新格[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谭永祥 1996 修辞新格(增订本)[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唐 钺 1923 修辞格[M].上海:商务印书馆.
- 吴士文 1986 修辞格论析[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邢 欣 2007 视角转换与语篇衔接语[J].《修辞学习》第1期.
- 徐国珍 2003 仿拟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徐默凡 2010 语形辞格的象似性研究[J].《当代修辞学》第1期.
- 杨玉玲 2005 “这”、“那”系词语的篇章用法研究[D].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 张德禄等 2003 篇章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